

# 譯者與贊助人

## 以林獻堂為中心的譯者群體

作者：楊承淑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先後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語言學（翻譯）博士及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研究科碩士，為「臺灣翻譯學學會」創會理事長及第五屆理事長。

回顧譯史研究中的贊助人與譯者，獨立贊助人長期持續擁有一群譯者的譯事活動，相對於官方扮演的贊助人角色，無論資源與體制上都難以比擬。然而百年前的臺灣，卻因為日本在臺殖民統治，因緣際會的創造了民間世家長期扮演翻譯贊助人角色的案例。其中期間最長、譯者人數最多的，應該就屬林獻堂與他的通譯兼秘書之間，長達數十年的譯史事蹟。探索這段贊助人與譯者之間的角色身份及譯事活動的屬性，除了可以檢驗譯史研究與翻譯理論的見解，更可針對日治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民間領袖——林獻堂（1881-1956），理解他如何透過譯者，展現自身文化公民與群體位置的意圖。同時，對於這批譯者所凝聚的群體力量與屬性特質，提出脈絡化的描述並給予適度評價。

林獻堂從 1895 年臺灣進入日治時期，就開始委由譯者居間傳達他與統治當局的往來接觸。透過 1927-1955 年間的《灌園先生日記》及多位前任秘書共同編撰的《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含〈林獻堂年譜〉）等記載，以及親近的秘書、友人、親人撰寫的個人全集或個別記述 [1]，再加上前人研究的揭露 [2]，可知經常為林氏通譯的譯者約達十餘人。這些譯者可以分為長期聘用的秘書兼通譯，以及針對特定議題而臨時指派的任務型通譯。

2016 年 1 月 20 日，楊承淑教授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第三屆《丘成瑤翻譯講座》，發表題為〈臺灣日治時期的譯者與譯事活動：研究課題與研究方法〉之報告，以 1895 至 1945 年臺灣日治時期為範疇，探究翻譯在跨國統治下的作用與意義。本文為演講報告第一個研究課題之原文，文中楊教授結合臺灣殖民史的實際情況，選取臺灣巨賈林獻堂（1881-1956）這一民間贊助人為焦點，試圖通過林獻堂一生中九位秘書兼通譯的工作生活，界定日治時期臺灣譯者群體的位置和特徵，並和當時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結合。



林獻堂。（維基）

而這群圍繞於林獻堂身邊的秘書兼通譯所創造的臺日跨文化溝通與活動裡，他們究竟參與了哪些價值判斷的思辯，並在新意識與新價值的形成過程裡扮演何種角色？本文將透過文本、史料、訪談紀錄等，探索這群贊助人與譯者共同創造的譯者身份與譯事屬性<sup>①</sup>，以及他們在林獻堂對外發言與行動時發揮的作用及群體特徵。

### 譯者與贊助人

據《林獻堂年譜》及其〈六十述懷〉詩 [3]，1894 年底至 1895 年間，15 歲的林獻堂奉祖母羅太夫人之命，率全家 40 餘口避難泉州晉江。到了 1897 年 5 月 8 日，亦即〈馬關條約〉載明的臺灣住民決定去就之日，林獻堂選擇留在臺灣，卻奉父命「在家塾由白煥圃授經史」。其實，林獻堂七歲入家塾「蓉鏡齋」受何趨庭啟蒙 [4]，漢學已有十年根底。17 歲時改從白煥圃讀經史之際，若也開

①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將僅探討秘書兼通譯的人物，而擔任臨時性的任務型通譯將另文討論。

始學習日語，大概終其一生都不會需要譯者居間傳譯。然而，何以他會做出這樣的選擇？據黃富三《林獻堂傳》指出，此舉顯示「其民族意識的強烈與不計功利、不務虛名的性格」[5]。進一步說，他的選擇可以視為對漢學認同與精進的意願，且也顯現了不接受統治者思想及其語言的立場，甚至直到日治晚期，他還鼓勵臺人青年要說不摻雜日語的臺灣話[6]。

根據佐藤春夫〈植民地の旅〉中的描述，當佐藤與林獻堂於1920年會面時，林氏就先解釋自己已是老人，不似年輕人大多能操日語，故只能透過通譯交談[7]。彼時的林氏固然不是太年輕，但在日治已達25年的歲月中，何以仍聲稱自己無法以官方語言溝通，似乎另有隱情。

然而，不以日語直接對話的立場，始終未曾改變。即使到日治中晚期（1930-1944），他的日語已有精進[8]，但他還是以不諳日語為由，婉拒擔任「府評議員」或夫妻聯袂出席皇居觀菊會之邀，甚至當局交付的政治任務等[9]。

據〈林獻堂先生年譜〉記載，林獻堂的次子林猶龍於1927年4月與留日期間結識的藤井愛子結婚[10]。據竹中信子指出[11]，愛子來臺後即學臺語、著臺服。此外，從《灌園先生日記》亦可知，愛子幾乎參與了林氏家族所有的公私活動，與林氏夫妻非常親近。不過，若非林氏貫徹其臺語的話語立場，何以日籍媳婦需要努力學習臺語[12]？

林獻堂的語文選向，除了深入學習漢學經史之外，他還透過留學並旅居中國的堂侄林幼春積極掌握中國的新知來源[13]，譬如自海外訂購上海《萬國公報》，以及梁啟超在橫濱創辦的《清議報》、

《新民叢報》等[14]。換言之，林獻堂不但早在日治之初，就已選擇了要以自己的語文與統治者對話的立場，而且始終如一。此一決定，也為林氏與譯者之間的贊助人角色，展開為期長達數十年的互動關係。

### 林獻堂的秘書兼通譯

林氏正式聘用的秘書共有十人：許嘉種（1883-1954）、甘得中（1882-1964）、施家本（1886-1922）、莊遂性（1897-1962）、葉榮鐘（1900-1978）、溫成龍、溫成章（1918-）、林漢忠（1918-）、楊天佑（1892-）、林瑞池（1926?-2010）。（詳見網站表1<sup>②</sup>）

根據巫永福接受許雪姬口述訪談時指出[15]，許嘉種是林獻堂的第一位通譯，之後才是甘得中、葉榮鐘。其中，聘期1-3年屬過渡性質的是許嘉種、莊遂性、溫成章、林漢忠，而任職6-8年屬長期聘用的秘書有甘得中、施家本、葉榮鐘、林瑞池。擔任秘書最久且兼任林家管事的是溫成龍與楊天佑（即楊雲鵬，但在《灌園先生日記》中大多稱「天佑」），他們兩位一直做到告老為止<sup>③</sup>。不過，他們後來管的大多是帳務與總務等內務，而非林獻堂對外的秘書，此類秘書極少兼任通譯[16]。

從《灌園先生日記》的記載，1940年以後秘書擔任通譯的比重似乎漸次下降，這除了是因為1945年脫離殖民統治，大概林氏也己能掌握日語[17]，而對通譯品質要求相對更高。所以，根據每次談話目的與需求的任務型通譯，往往取代了秘書所做的通譯，至於秘書的通譯工作，據葉榮鐘[18]與甘得中[19]的記述，對外主要的工作是與訪客

會面（如梁啟超、矢內原忠雄），或與總督或日方高官會談等。

從《灌園先生日記》、《臺灣人士鑑》等記載，可知擔任過秘書的人日後還是會伴隨林氏或充任通譯，如許嘉種 [20]、葉榮鐘 [21]、莊遂性（垂勝） [22] 等。可見，歷任秘書與林獻堂的關係長久而密切，且印證了通譯工作漸由專職秘書交付任務型通譯的變化。專職秘書的工作包含助理、照護、看帳 [23]、通譯、書函、公關、隨行、嚮導 [24] 等，身兼生活照顧、語文代理、對外接洽、帳務處理等多重身份。由於是私人秘書，故在林獻堂的不同年齡與處境之下，秘書的工作也各有差異，再加上每位秘書的通譯能力不一，因此通譯角色與份量也不盡相同。

尤其，在生活照顧方面，隨著林氏年齡漸長，體力趨弱，秘書所負擔的照護與雜務、甚至人際往來等支持性的角色功能，有日益加重的傾向。就語文與知識技能而言，秘書所扮演的角色發揮了代筆、代言，以及代理林氏送往迎來的公關活動，或是代辦業務等扮演林氏的化身。

然而，若從譯者的角度觀察秘書與林獻堂的互動，會發現其中似乎未必只是聘雇關係而已。秘書中因林氏資助而留學的，計有：甘得中、莊遂性、葉榮鐘、林漢忠等，葉榮鐘甚至曾兩度接受林氏資助，完成在日本的大學學業。葉榮鐘首次獲得資助，是在恩師施家本的引見下獲此機會；當時葉榮鐘與林氏其實並不認識。據林獻堂最後一位秘書林瑞池指出，他曾估算林氏一生資助過的學生約達 3,000 人 [25]。由此數據觀之，林氏的贊助人屬性似乎是某種社會理念的展現，其中頗有促成臺人知

識框架擴張與改變的社會改造意涵。此舉與他長期致力於為臺人建校的心願，看來是前後一致的。

可以說，林氏的贊助人角色與行動，並非僅是單純的個別事例，而是具有社會意識的長期計畫。在如此強烈的社會意識之下，林氏聘任的譯者，必須成為林氏意識型態與價值判斷下的忠實代言人，才堪當林氏代言人的重任。

### 譯者之生平及譯事活動

除較少從事通譯的楊天佑之外，本節將針對林獻堂每位秘書兼通譯的背景與事業歷程，依據史料以及林氏日記、譯者著述或訪談內容等，概述其多重身份的開展脈絡及共同特徵，以及譯者與林獻堂的互動和對應關係。（詳見網站表 2）

#### 許嘉種（1883-1954） [26]

臺灣彰化人。幼習漢學，1903 年畢業於臺南師範學校後<sup>④</sup>，1904 年任教於彰化員林公學校擔任訓導 [27]。1906-08 年間擔任林獻堂的通譯。1917-21 年任臺中州廳通譯，1921 年辭去。1922 年參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加入文化協會成為骨幹。1924 年擔任文協彰化支部幹部及臺灣民眾黨

<sup>②</sup> 編註：本文原附大量表格，因篇幅關係均移往〈數理人文資料網頁〉

<http://yaucenter.nctu.edu.tw/periodical.php>

<sup>③</sup> 據 2011 年 9 月 13 日林獻堂長孫林博正先生受訪時表示，這兩位秘書就任後即未曾離開林家。

<sup>④</sup> 許世楷為許氏次子乃邦之長子。他 2011 年 9 月 18 日受訪時指出，許氏入學時校名為「臺南國語學校」，但畢業時學校已於 1902 年更名為「臺南師範學校」。



甘得中。出自連雅棠編《人文薈萃》（1921），遠藤寫真館。（維基）

中央執行委員。1927年與賴和等發起「政壇演說會」。1935年於臺灣第一回選舉中當選，1936-39年任臺中州彰化市會議員。1936年組織「昭和信託株式會社」，任專務取締役。

許氏曾經擔任過教師、通譯、秘書、政黨幹部、民選議員及企業創業者。他擔任林獻堂秘書兼通譯，只是從學校進入社會的短暫經歷。然而許氏當時主要背景是教育界，年齡也不過弱冠之齡，還處在人生起步階段。從許氏一生的政治活動與創業行動看來，林氏似乎扮演了啟蒙良師的角色。尤其，許氏辭去臺中州廳通譯後，中壯時期積極投入臺灣最重要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一路追隨林獻堂投身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加入文化協會成為幹部，並擔任民選議員。這長達十餘年的政治活動，兩人之間的贊助與呼應關係可說互為表裡。

許嘉種不僅與林獻堂年齡相仿，兩人還有表兄弟關係<sup>6</sup>。但許氏選擇進入國語學校的教育路徑；日常習用日語，閱讀也以日文為主。他最尊崇的人是福澤諭吉，出於對文明化的高度嚮往，他為子女教育所做的選擇也都以日本菁英之路為其途徑。他本人無法如同時代曾讀私塾的同儕那樣吟詠唱和漢詩，但卻有鮮明的文化認同。

### 甘得中（1882-1964）[30]

彰化人。幼習漢學，1902年畢業於彰化公學校。1906年春（23歲）在林獻堂資助下赴日求學三年，但因肺疾返臺[31]。東京正則英語學校普通科[32]，其後進入早稻田大學<sup>6</sup>。1914年參加臺灣同化會，熱心文化社會運動。1920年返臺，同年任

彰化郡秀水庄庄長，1923-36年任官派臺中州協議會員；1937-40年當選臺中州州會議員。曾任大新商事會社取締役，皇民化時期任皇民奉公會臺中州支部委員。戰爭後期赴中國，任華中煤炭製造廠理事、上海新華企業公司社長、新東亞興業製紙廠理事等職。

據〈林獻堂先生年譜〉及甘得中的追思文章〈獻堂先生與同化會〉等記載，甘氏赴日前一年（1905年），即辭臺中醫院臺語講師職，進入林家「就教莊舉人竹書先生於萊園」[33]，因此可以推估，甘氏從赴日之前乃至留學期間，即有為林家服務之實[34]。其中包括，接應林氏長子攀龍及次子猶龍赴日就讀（1910年），甚至1914年三子雲龍及侄兒陸龍（其弟階堂之子）赴日求學，想必甘氏也有所協助。甘氏擔任林獻堂秘書的期間，很可能就是他留學日本期間，推估應為1906-14年[35]。

蒙甘氏孫女盧千惠女士惠賜林氏致甘氏信函[36]，函中指「得中老弟 英鑒書來說諸兒輩近況甚詳，不異親見之也，深謝用心周到。如再遇攀猶請教之以勤儉，而攀龍尤宜勉之以誠信」。又言，「陸夔雲俱壯健殊為可喜」。而言及尚未在日就學的愛女關關（1906-1997）時，則提到安排入學之曲折。函中對甘氏直稱「老弟」，落款則為「獻堂」。信中三分之二談孩子的教育，另外三分之一另有他事託付，可知倚重甚深。而據林攀龍（1901-1983）年表可知[37]，1910年4月林獻堂率攀龍與猶龍（1902-1955）往東京求學，寄宿於

日本教育家嘉納治五郎家中，1914年林氏再率三子雲龍（1908-1959）及侄兒夔龍到東京就讀。對照前函內容及其兒女年齡，即可確認甘氏在東京時與林家的往來情況及時期。

此外，據〈林獻堂先生年譜〉1907年記載，「民前五年秋，先生偕甘得中由東京歸臺」<sup>5</sup>，先往橫濱、繼往神戶，擬訪梁啟超。不意途次奈良旅社，甘得中從登記簿中循線探訪到梁任公本人。當晚的林梁之會，甘得中雖無法居中傳譯，但留下梁公筆談內容及其記載，確是臺史中聞名的一段佳話。

而1911年3月24日任公來臺時，林氏邀連雅堂先生等迎於基隆碼頭，當時大船還無法靠近岸壁，於是甘氏乘小艇進艙會任公。可見，甘氏幾乎是以林獻堂分身的身份，前往迎接仰慕已久的貴賓。此外，翌日的迎賓宴席之後，偵騎四出追問與會者何故參加。「聞有感到惶惑者，不曰林獻堂，則曰甘得中相邀，我所以參加。」可知當時甘氏的秘書身份與林氏之間，無論公私都極為緊密契合。

兩人年齡接近，雅好詩文，但個性迥異。據甘氏回憶[38]，1914年秋他與林氏赴日拜訪政界高官，適逢總督府長官內田嘉吉在京，林氏於是招甘往謁，但對方態度高踞，「非止無杯茶相待，連叫坐也沒有。余憤謂翁曰：尋他作甚？翁默然。」回臺後，

翁猶要偕余往謁，余殊不懌。翁曰：子且忍耐，乃勉與俱行。至官邸，門吏謂閣下方入浴，余喜極則投以刺，且云：我們別無他事，因歸自京，特來致敬耳，回頭就走。蓋以不見為清靜也。

這段出自甘氏本人的文筆，非常傳神的披露了兩

人的性格差異與互動關係。林甘之間彷彿知友，甘不掩其性情，林也不改其初衷。但兩人之間卻未見摩擦，甘氏總依林氏意志行事，並常扮演林氏分身或代言人的角色。而甘稱林氏「所見之遠，思慮之周，尤足以使余追思」；其中信賴與敬重之情，更是溢於言表。

即使到了1930年，林氏三子雲龍成婚時（9月27日），甘氏仍為讀祝辭[39]。而1930年9月25日的記載，則見甘氏「率其女寶釵、女婿張月澄來訪，他兩人將於廿七日之船往南京留學」；可見雙方往來甚為親近[40]。據《灌園先生日記》1943年10月20日記載（見下頁圖），那天是甘氏的還曆生日<sup>6</sup>，在家宴請至親好友。而林受邀前往彰化時，甘氏夫妻與二子皆往火車站相迎，至為慎重。從1927年初到1944年底，記載了甘氏的日記達120餘筆，可見無論婚喪喜慶或日常行事，兩人皆往來頻繁，且常擴及家庭成員。甚至，甘氏為人謀事（1931年6月28日）、或為姪輩借款（1931年12月10日）等，都是央請林氏出面，而林也確實盡心回應[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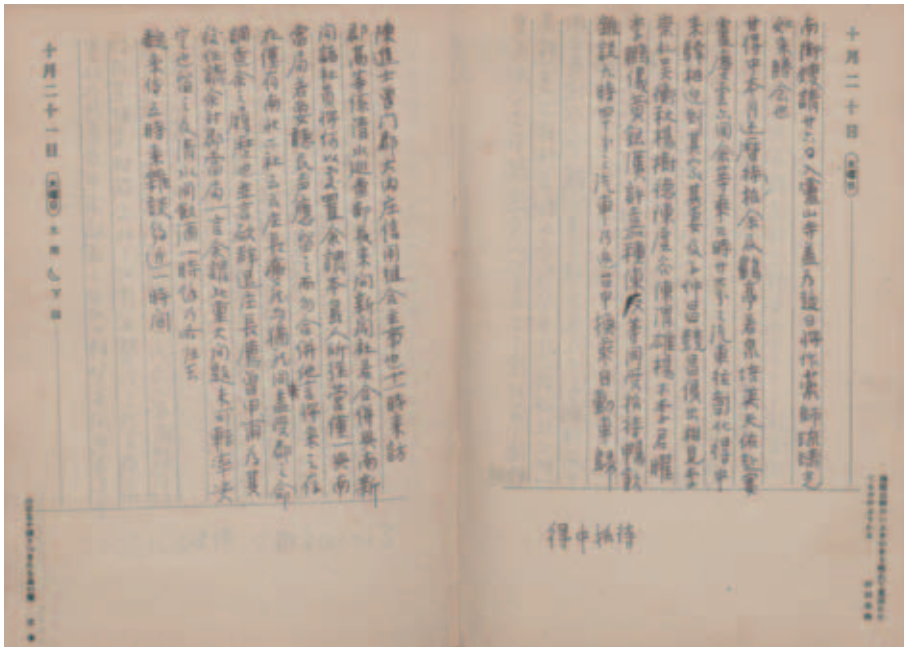
甘得中一生跨足政商，戰爭後期赴中國後的主要

<sup>5</sup> 許世楷於2011年9月18日受訪時賜告。

<sup>6</sup> 經查早稻田大學校友名冊，並無甘得中姓名記載。許世楷大使推估可能是進入先修班就讀。

<sup>7</sup> 1907年3月，是林獻堂第一次前往日本遊歷，想必甘得中當時也扮演了嚮導的角色。

<sup>8</sup> 編註：「還曆」又稱花甲、還甲、回甲，由於以前用天干地支表示年齡，每60年會重複一次，所以人到60歲時就逢「還曆」。



《灌園先生日記》1943年10月20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

校規而遭退學。1909年前後任鹿港公學校教員 [45]，後任臺中州民事調停課翻譯。1906年曾在漢書房（私塾）擔任教席，林獻堂長子攀龍隨之習四書五經 [46]。1913年受聘為霧峰林家記室，掌

理臺中中學創校事務。1914年加入同化會，為會務積極奔走。1915年轉任林獻堂秘書兼翻譯，從事「六三法撤廢」運動。1920年離開林家，謀自行創業。不幸於翌年12月6日遽告病逝，年僅36歲。遺命墓碑署「詩人施家本之墓」。

施氏學養深厚，才氣縱橫，善漢詩與和歌。1919年加入櫟社，1921年與陳懷澄、莊太岳等在鹿港共組大冶吟社，並任社長。應天皇「敕題」所作之和歌，曾為御歌所選取。因好14世紀兼好法師之《徒然草》，自名其書齋曰「徒然草堂」，著有《徒然草堂詩抄》、《肖峰詩草》。

據葉榮鐘指出 [47]，施為舉人嫡子，頗受鄉里敬重。才情並茂，浪漫多情。1911年因梁任公到訪，施氏參與詩會才與林獻堂結識。1913年受聘為林家記室之後，他的才華得到了施展的機會。1914年積極為同化會奔走，也是他獻身社會運動的開始。

#### 施家本（1886-1922）[44]

擔任林氏秘書期間（1914-1920），海外書報等知識來源充沛，且有機會陪同前往香港、上海、東京等地，其中東京每年達一至兩次，因此這份工作真正讓施氏達到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優遊自在。施氏博聞強記，文采奪目，讓林氏的文化光環增色不少，他自己也深得日人看重 [48]。而林獻堂日後

彰化鹿港人，其父施仁思為舉人。1895年隨父內渡，兩年後父母皆逝，因而輾轉返臺，由庶祖母撫養成人。1903年就讀鹿港公學校，兩年內修畢四年學業。1905年考入國語學校，翌年卻因觸犯

活動則為工商製造業。從職業歷程看來，他曾經擔任語言教師、通譯、秘書、庄長、議員及企業創業者、經營者等。擔任林獻堂秘書兼通譯，是他在日留學期間的主要工作。從1905年（22歲）進入林家到1914年（31歲），這段期間是他生命中求學與處世的奠基階段。擔任林獻堂秘書讓他從臺灣走向了日本，也開闊了視野。

從甘得中一生政治與商業活動同時並進的情況看來，他與林獻堂的路途可說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例如，甘氏曾加入同化會，回臺後擔任庄長與議員等公職，進而當選民選議員。將近20年的政治活動，與林氏民族自決與地方自治等理念是頗為呼應的。至於工商活動方面，甘氏雖有意邀約林氏，可惜雙方想法未必相同 [42]，但兩人仍往來頻繁，甘受挫時林亦給予安慰 [43]。而晚期以工商活動為主，甚至前往中國發展，似乎也反映出甘氏性格中積極開拓的一面。

據葉榮鐘指出 [47]，施為舉人嫡子，頗受鄉里敬重。才情並茂，浪漫多情。1911年因梁任公到訪，施氏參與詩會才與林獻堂結識。1913年受聘為林家記室之後，他的才華得到了施展的機會。1914年積極為同化會奔走，也是他獻身社會運動的開始。

提起施氏時，仍對他的才華頗表欽佩 [49]。

施家本與其他秘書不同之處在於他瀟灑不羈的性格及詩人氣質，可惜英年早逝，故一生功績主要在詩文方面。施氏一生最燦爛的時期，也就是擔任林獻堂秘書期間；在此之前，他只擔任過教師、翻譯等工作。可以說，這段邁入而立之年的時光，是他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進程階段，例如同化會、《六三法》撤廢運動（經林呈祿鑽研提案的利弊得失後，建議改稱「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同時，這些社會參與都是出於林獻堂的啟蒙與導引。

施家本僅小林獻堂五歲，並未受林氏學資之助，也未將秘書當成過渡性質的工作，且兩人之間應有鞏固的信賴基礎才得以維繫數載。尤其，施的浪漫性格與林的拘謹自持原本大相逕庭，而能夠朝夕相處的基礎，應是出自性格上的互補才不致於牽強。此外，施的詩文才華讓林傾心，也是兩者得以契合的基礎。質言之，才情並茂應該是林獻堂重視的內在價值，因而也反映在其秘書人選的特質上。

### 莊遂性（1897-1962）

鹿港人，名垂勝，字遂性。父為前清秀才，叔父為舉人。1907年公學校畢業，因家貧未升學，而於1915年考進公費的「大日降糖業研習所」。1917年畢業後進入「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蒜頭工場任農務技工。1920年因表兄施家本離職而接林氏秘書職。旋即因林家族人有少爺赴日留學，願負擔伴同者學資，故決意就任 [50]。1921年赴日本明治大學就讀，1924年畢業於政經科，留日期間加入「新民會」（林氏於1920年12月出任會長），畢業後曾往韓國及北京上海遊歷考察。1925

年隨林獻堂自東京返臺後，積極從事文化啟蒙運動，參與文化協會活動並創設「中央俱樂部」介紹合理的衣食住新生活方式。1926年獲400多人響應，集資四萬圓創辦中央書局，進口中日精良書籍，以傳播新知。1927-31年加入民眾黨。1932年與賴和、葉榮鐘、許文葵、洪炎秋等共創文藝雜誌《南音》[51]。1946年出任省立臺中圖書館長。晚年不問世事，過著半耕半讀的生活。1962年（65歲）病逝。

莊遂性擔任秘書期間僅約一年，但任秘書之前就已跟隨林氏赴日，與林獻堂原本熟識且印象不錯。因此在施家本去職時，他是施的表弟就順勢遞補。能接手才子施家本的工作，想必能力頗佳。任職不久即受林氏長期資助赴日留學，頗受林氏賞識。

從兩人1939年12月21日的通信看來，林獻堂在與莊遂性推敲自己的詩作時，函中稱莊氏為「君」而自稱「愚」；起首稱「遂性君雅鑒」，落款則自稱「灌園」[52]，顯然十分敬重對方。莊氏的覆函則顯得十分鄭重，稱林為「獻堂先生」，文中以「敬悉尊體（日漸痊癒）」、「您老人家」等敬稱或敬語行文之外，且又加上「以後請毋須拘介為便」，可見莊遂性亦有誠惶誠恐之感。不過，從另一封信的稱謂與文字看來，林氏似又不如前函敬謹。由此看來，前一封信應是出於對莊氏書法與詩文涵養的尊重，同時也顯現出林氏的讀書人本色。

莊遂性擔任秘書期間雖然極短，但他留日期間乃至返臺時期所投入的文筆工作或社會活動，都與林獻堂主導的運動是互通聲息的。《灌園先生日記》關於他的記載多達627筆，可知他與林氏互動始終密切，甚至多年後亦復如此。例如，莊氏在二二八



葉榮鐘任林獻堂秘書兼通譯時期。(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事件中受累被捕七天，為他出面向軍方說明的正是林獻堂[53]。葉榮鐘稱莊遂性為「臺灣的文化戰士」[54]，正反映他投入文化活動的態度與深度。文學家陳虛谷之子陳逸雄曾指出：「父親曾說，他尊敬的朋友一為賴和、二為遂性，諒是賞識遂性不求名利的狷介性格及其重情誼的為人。」[55] 如此人格特質，應是林氏為他挺身而出的理由吧。

#### 葉榮鐘（1900-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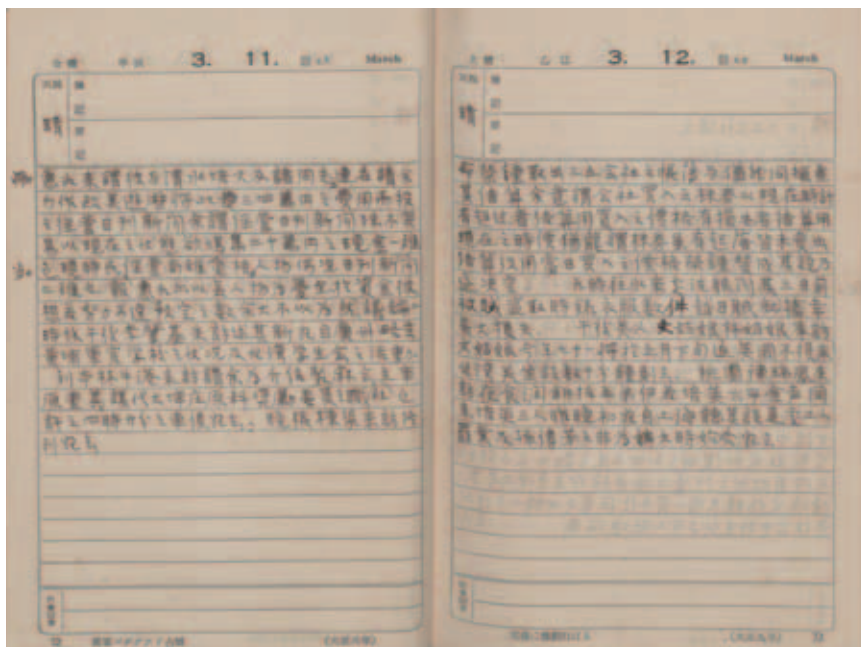
鹿港人。1914年鹿港公學校畢業，1918年受林獻堂資助赴日留學，入東京神田正則英語學校學美語，並於研數學館習代數。1921年返臺任職糖廠，但因參加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遭革職。同年春夏之間，轉任林獻堂秘書兼通譯直到林氏赴歐美遊歷（1927年5月至1928年4月）。其後，再受林

氏資助於1927年8月入東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1930年5月畢業返臺，旋即籌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要求地方自治。1931年春結婚，年底受林獻堂資助創辦文藝雜誌《南音》。1935年底任《臺灣新民報》通信部長兼論說委員，每週撰述一篇日文社論。1940-41年任《臺灣新民報》東京支局長。返臺後該報改名為《興南新聞》，任臺中支局長。1944年全臺日報合併為《臺灣新報》，改任該報文化部長兼經濟部長[56]。1946-47年任臺中圖書館編譯組長。1948年入彰化銀行，1966年退休。

葉榮鐘18歲拜林幼春學詩，43歲（1942年）成為櫟社社員。一生大多致力於文筆與報社雜誌等媒體，即使進入銀行也不離文職工作，退休前一年還著手撰寫《彰化銀行六十年史》，退休後更專注於撰述日治時期政治社會運動史，在《自立晚報》連載五年，計278回，達50餘萬字。綜觀一生，前段屬文職工作，除秘書兼通譯外，繼任報社記者、社論主筆、報社主管等，後段的銀行業務則包括調查科長、人事主任、主任秘書等。而後者資歷見諸於年表者，卻只有初進銀行的1948年有所記載，餘則僅記錄其詩文等作品，可見其志不在此。

他追隨林獻堂幾乎達40年，兩度受林氏資助赴日留學，並擔任秘書兼通譯約達七年，直到1927年5月15日林獻堂偕次子赴歐美遊歷為止。而1928年5月25日至11月8日，林氏遊歷後滯留東京將近半年[57]。當時，林與子侄及葉榮鐘同居一處，相處十分密切，而1929年3月5日至4月21日林氏再度赴日，彼時葉雖仍在東京，《灌園先生日記》日記中陪同通譯者卻經常換人，且大多由親友充任，想必當時葉仍在求學，故並未擔





任秘書或通譯。到1929年4月21日，林氏決定起用溫成龍。因此，葉氏擔任秘書兼通譯，正是青年立志與成長的21-27歲之間。擔任林獻堂的秘書，對於葉氏一生的志向與視野，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5月12日記載，葉榮鐘大學畢業返臺謀職時，林氏有意推薦他進入新民報社，但社裡卻有人以他酗酒、打架、侮辱他人等為由反對。故林與葉懇談，勉其「願汝痛改，免遭疵議」；而此時「榮鐘大感動，至於淚下」。從這段日記看來，林葉之間是坦率直言、真情流露的。據葉榮鐘自述，他好打抱不平、行俠仗義，往往形諸於外；而這種為他人抱不平的性格，其實林氏亦有之，只是偏向克己內斂。此外，兩人皆好詩文，1940-41年間葉氏奉派至東京，故得「同遊同詠，雪泥鴻爪，到處留連」[58]。得利於天時、地利、人和，以作詩吟詠為樂，互動融洽。其實，葉氏離任秘書之後，兩者往返依然密切。從灌園日記中葉氏出現的次數看來，他應是所有秘書中與林獻堂生活中接觸最多，相關書寫也最多的一位。

做為林氏秘書兼通譯，葉榮鐘為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34）及文化協會等林獻堂積極推動的政治社會運動，扮演居中傳遞訊息或協調的角色。此外，在林氏的財務管理上，他也受到信賴與重用。例如，1927年3月12日的日記中記載（見上圖）：命榮鐘取出三五會社之帳簿，與猶龍同檢查其結算。余意謂會社買入之株券以現在時計（實際？）有超過

者，結算用買入之價格；有損失者，結算用現在之時價。猶龍謂株券雖有起落，皆未賣出，結算須用當日買入之價格。榮鐘贊成其說，乃遂決定。

依照一般會計常識，林氏才是對的，但不知何故竟以兩位小輩之多數為議。能信賴葉氏與其子一起結算帳簿，可見彼此親如家人，且信賴有加。

### 溫成龍（19\*\*-19\*\*）

根據《灌園先生日記》及其註解[59]，1919年溫成龍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師範部乙科。他先任職於彰化第一公學校，後因在帝國製糖廠受歧視，故於1927年1月15日向林獻堂表示有意就職於大東信託，結果雖未如願，1929年4月21日即「採用溫成龍為通譯」，直到1937年4月，共八年。

從日記內容看來，八年期間溫成龍除了通譯之外，還掌理一新會的活動，例如司儀、結語、甚至多次擔任講師。然而，重要通譯通常另有其人，他所擔任多半是一新會或是日常業務的通譯[60]。

對於他的能力，林氏似乎頗有微詞。其中情節嚴重者，有因其虛妄之言，致使生訟而需付和解金三

② 1929年3-4月間充任通譯者：羅萬俤、林呈祿、楊雲萍、呂靈石、莊垂勝、施純孝（林獻堂表甥）等人。

百元，故林指「皆因溫成龍無常識，有以致之也。」（1930年5月8日）。又如，有人來電告，成龍在醉月樓擲杯翻棹，非常橫暴。「余聞，怒成龍之非理，以致不寐」（1937年4月15日）。到後來，又有一新會教師劉集賢來訪（1939年3月2日），「述去年與溫成龍意見不合，辭退新光會社之職。」依此看來，溫成龍脫軌的行事作風不止一端，顯然頗令林氏傷神。

其甥（林氏長姊次子）呂靈石有意在林家工作，林即透露「但余處有成龍在焉，使成龍轉任於民報社或自治聯盟，想萬俾、肇嘉決不能承諾，若使其辭職未免可憐」（1930年10月5日）。可知溫成龍表現確實不盡理想，林氏又不得不予以照顧。

林獻堂於1937年5月17日赴日，直到1940年10月27日返臺，這段期間擔任隨行秘書的是溫成龍之弟溫成章。如此安排或許是因為溫成龍妻於1937年4月病故[61]，且「成章個性內斂、人品修養俱佳」，遂採用同往東京。但據林博正訪談時賜告，在他與祖父母同住時（1941至1949年），溫成龍還在林家工作，並未去職[62]。

據1938年6月5日的日記：「修寄溫成龍之信，言補助賴宜俗之子之學費自四月起全年加54元，合計百五十元。」可見彼時成龍與成章同時擔任臺日兩地秘書[63]。此外，以溫成龍在1927-44年的360筆日記記載中，僅有12次日常事務通譯記錄，由此可知他不是以通譯為主的秘書[64]。

#### 溫成章（1918-19\*\*）

據《灌園先生日記》1937年3月29日載，溫成章畢業於臺中一中，畢業前夕隨其兄成龍來謝林獻

堂學資補助。同年5月17日隨林氏及猶龍妻小離臺赴日。1940年擬辭職就讀音樂學校，並請林氏補助學費，林未允其請，遂於是年3月辭職。8月回臺後再赴日，林氏助其旅費。1941-43年早稻田大學專修科畢業後，返臺就職新光紡織廠[65]。

從林氏日記觀察成章在東京的日子，其工作似以食衣住行育樂、跑腿打雜、看病取藥等日常事務為多。甚至，有時還要陪同上街購物、理髮、接送等瑣事。在總計440筆關於他的記載中，此類伴隨工作即有166筆，將近四成。[66]

另一方面，依林氏日記顯示，溫成章擔任通譯的次數極少，僅約六筆，且大多集中在1938年。即使加上他陪同林氏訪問日人或許也做了通譯，還是只有12筆。在近三年440筆記載中通譯次數相對極少，與其後僅接任八個月的林漢忠相比，相形之下比重更低。或許擔任通譯並非他的主要工作。

在日期間，溫成章不像葉榮鐘那樣與林氏同住，而是住在離林氏住所三分鐘之處。此外，成章體弱之餘，常有悲觀之念。有時因夜不成眠，致使出門訪客之約被迫取消[67]。最嚴重的一次是1938年5月1日，因受林氏責備而仰藥送醫住院數日。

他甫出校門即擔任林氏秘書，且又立即遠渡日本，無論年齡與社會經驗皆不足，導致身心倍感壓力，似乎難以勝任公關或通譯等對外工作，故轉為服務內眷或料理內務等瑣碎雜務，想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 林漢忠（1918-19\*\*）

林漢忠出身霧峰林家，1937年臺中一中畢業後赴日求學。1940年3月16日溫成章辭職後，即由



林獻堂（右二）與長子林攀龍（左二）、林瑞池（左一）。（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當時甫自同志社大學畢業的林漢忠遞補，擔任八個月的過渡性秘書職。他於 1940 年 10 月底與林氏一同返臺，1941 年由林氏安排進入新民報社。1946 年當選光復後首屆基隆參議員。他的家庭背景與社會位階與林氏其他秘書的出身大相逕庭。唯一相似的就是年齡以及初出校門的起步階段並無二致。

林氏日記裡關於林漢忠的紀錄共 277 筆。其中，任通譯的明確紀錄僅六筆，伴遊紀錄卻有 133 筆。固然由於當時時局緊張且林氏即將返臺，經常要處理瑣碎雜務，平均起來每月約僅有一次口譯機會。而且這些為數不多的記載，有半數是與攀龍一起，因此也可能是由攀龍擔任通譯也未可知。至於通譯主題，則多屬會客或處理日常事務等性質。

### 林瑞池（1926?-2010）

林瑞池為臺中太平人，臺北中學畢業後入臺灣青果合作社服務，1946 年 2 月進入彰化銀行擔任秘書，1949 年 9 月 23 日以秘書身分隨林獻堂赴日 [68]。從他進入職場的經歷看來，當時已進入彰銀三年半，且在此之前也有職場經歷。因此與過往的秘書相較，無論年齡或社會經驗，都算是稍微成熟的人選，但仍屬未滿而立之年的青年。

他隨林氏在日生活到 1956 年林辭世為止。林獻堂過世後，林瑞池即在林氏擔任顧問的「東南商事」工作，同時進入東洋大學經濟系就讀 [69]。所以自林瑞池赴日，直到 2010 年過世為止，一直旅

居日本。據他接受許雪姬訪問時指出，林氏在日時期無論公私事務的口譯與書寫，都很需要翻譯 [70]。

但從林獻堂 1949 年赴日後的日記，直接寫明由林瑞池擔任通譯的會談情況似乎不多。事實上，1941-45 年之間《灌園先生日記》裡的通譯記載不但次數甚少（每年僅十次上下，總計 42 筆），且大多由親友家人充當。其中通譯次數最多的，是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經濟系的外甥呂磐石 [71] 共計十次，其次是長子攀龍計六次，再來是次子猶龍及外甥女婿林金荃<sup>10</sup> 都各五次。簡言之，愈到後期愈少讓外人擔任通譯。（詳見網站表 3）

日治末期進入戰火熾熱期間，林獻堂需要通譯的機會不多，他的秘書就由主掌內務的楊天佑與溫成龍等人擔任 [72]，幾乎不做任何通譯。反而是 1949 年 9 月林獻堂赴日後，林瑞池擔任秘書期間，由於環境需要，通譯又成為秘書的日常工作。只是從重要訪客的公務或正式晤談，轉變成支持林氏生活的通譯內容，故日記裡的記載也大幅減少。

### 譯者的多重身份與角色變化

本節將綜合前述秘書與林獻堂的關係等紀錄，進一步探究秘書的個別屬性特質，以及他們擔任林氏秘書期間的共同脈絡。主要課題為：（1）譯者屬性、（2）譯者的角色變化、（3）譯事活動及目的。

<sup>10</sup> 林金荃，1933 年臺中商業學校畢業。其妻曾秀容為林獻堂夫人楊水心的外甥女（楊水心四妹之女）。

## 譯者屬性

秘書兼通譯者與林氏的人際脈絡，主要來自血緣或地緣關係。與林氏有親戚關係者為：許嘉種（表兄弟）、林漢忠（侄孫）。而地緣關係之中，亦有師生或手足等緊密的人際關係。例如，秘書之間有地緣關係者為：施家本、莊遂性、葉榮鐘同為鹿港人。秘書間有特殊關係者：施與莊 [73] 為表兄弟，施與葉為師生關係；溫成龍與溫成章為兄弟。此外，九位秘書之中，前五位是彰化人。溫成龍曾任職彰化第一公學校，溫成章畢業於臺中一中，第八位是侄孫林漢忠 [74]，林瑞池則是臺中太平人。林氏秘書大多出身臺中彰化等地區，與林氏信任其親人或前任秘書介紹，想必也是構成地緣性人際脈絡的關鍵。關於他們擔任秘書的年齡及其受聘前的教育背景與職業經歷，請見網站表 4。

這些秘書任用之際大約 20 來歲，且大多初出社會，或在短暫進入職場或教職之後。由於日治時期臺人接受的學校教育，除了啟蒙的公學校（四至六年），其後大多以公費師範體系（兩年）為主，畢業後須到學校服務三年。循此途徑的人有：許嘉種、甘得中、施家本（國語學校肄業，但曾任公學校教師）、溫成龍。未循此途徑者，莊遂性、葉榮鐘皆因家境貧困；前者選擇就讀大日本製糖公司開辦的「大目降糖業研習所」，後者公學校畢業後未升學，18 歲受林獻堂資助負笈日本。林漢忠是林家成員，臺中一中畢業後直接赴日求學 [75]，林瑞池雖非林氏直接聘用，但在年齡、教育背景、職場經歷等方面，似乎與前述秘書的選拔基準並未偏離。

從教育背景與語文能力看來，前期的許嘉種、甘

得中、施家本、莊遂性，都具有相當的漢學根底，其中施與莊的父親分別是前清舉人與秀才，而中日文造詣俱佳者，以施家本為翹楚。據葉榮鐘 [76] 指，施家本漢學功底紮實，和歌深受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稱許，屬才子型文人。而莊遂性、葉榮鐘可稱和漢皆優，兩人都有日本大學學歷，漢詩亦達櫟社成員水平。這類能詩能文的秘書，特別受林氏賞識，尤其在探討詩作時，都顯得格外敬重，往往以其雅號互稱，字裡行間完全跳脫主從分際 [77]。由此可見，林氏對於文人的看重，頗為誠懇真摯。

就秘書的年齡與教育水平看來，林氏選拔的大多是初出校門的年輕人。他們因此接觸同年齡與社會位階難以接近的日臺政治、文化、社會等菁英，因而視野大開。當這些年輕人從林氏譯者的角度介乎其中，自然開始認識日臺人交往時的立場、談論議題、溝通情境，進而受到某種薰陶。這在他們日後的詩文或話語裡，都反映出頗為鮮明的立場。例如甘得中、施家本、莊遂性、葉榮鐘皆屬之。

以人格特質而言，九位秘書大抵可分兩類：一類個性強烈、情感外放；另一類個性沉穩、情感內斂。前者以甘得中、施家本、葉榮鐘、溫成龍等長期任用的秘書為代表，後者以許嘉種 [78]、莊遂性、溫成章、林瑞池等為代表。從林氏日記及他們的文章或訪談，大致可看出每位秘書的性格。至於，林氏何以能長期與個性外放的秘書相處，大概可以說是與林氏形成互補效應所致吧。

談到秘書的通譯水平，一如佐藤春夫〈植民地の旅〉的描述，林氏對於通譯品質十分在意 [79]。但在精微或未察之處，似乎尚難明察秋毫。據其日記，經由家人或日本友人提醒，才知發生通譯偏差

的是溫成龍。其次，則是身體與精神狀況欠佳的溫成章，故最少委以通譯工作。而通譯工作較少的林漢忠，可能是任用期間過短，未進入狀況所致。可見，除語文能力之外，譯者的精神狀態及人事熟悉因素等，都是影響通譯是否受到重用的因素。

### 譯者的角色變化

從林氏日記看來，似乎人人皆可充當通譯，只是在緊要關頭，林氏對通譯人選還是會慎重其事，未必交付日常擔任秘書的通譯。另一方面，經常對外並兼掌通譯的秘書也不會長期以此為業，往往轉向求學或其他職場。從林氏秘書的求學、求職、轉職、乃至人生重大轉折等關鍵時刻，得以探索譯者的角色變化。此外，透過林獻堂的日記亦可察知林氏與秘書之間的關係。為掌握譯者的屬性，綜合歸納林獻堂中意秘書人選的特質，網路表 5 整理了各秘書任用前後的學經資歷及社會活動內容，由這些主要變化，依其重要特徵再分類整理為網路表 6。

由林氏歷任秘書的學經資歷變化可以歸納出，擔任林氏秘書兼通譯者，日後大多在教育上有所精進。原因除了受林氏資助之外，林氏身邊皆非等閒之輩，大概也是促使秘書積極深造的動力。其次，林氏雅好詩文並敬重文人雅士，顯然也深刻影響歷任秘書。此外，他們頗具開創性格，無論文化事業或社團，乃至創建企業者皆有之，比重達全體七成以上。

受林氏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追隨林氏政治主張或社會理念的運動。他們的投入方式除長期擔任幹部之外，有些還經常參與，積極支持。更積極且擁有資源者，則直接投入競選活動，角逐民意代表。

成員中有三成比例投入相關運動，頗具份量。

至於經濟活動方面，除最早期兩位秘書曾自行創業之外，其餘秘書留學時也大多主修經濟。例如莊遂性與葉榮鐘主修政經，林漢忠與林瑞池主修經濟。不過，他們返臺後未必投入經濟活動，反而進入報社擔任記者（葉榮鐘、林漢忠）或開辦書局（莊遂性）。或許當時臺人環境艱苦，學習實用之學蔚為主流，在專業選擇上並非受到林氏影響 [80]。

然而他們在離職後，就業上得力於林氏提攜頗多。從林氏日記或當事人的記述即可看出，直接由林氏安排的有：葉榮鐘、林漢忠、林瑞池。此外，其後轉職或事業擴展，林氏也都出錢出力（葉榮鐘、甘得中）。甚至，連下一代就學（寫信慶賀莊遂性長子林莊生高中臺中一中 [81]）、就業（為許嘉種長子許乃昌謀事）、乃至婚姻等都給予協助與關懷（甘得中之女寶釵婚姻觸礁致早逝）。

以日治時期與光復之後相較，前期秘書與林氏關係極為緊密，無論公私領域都頗有交集，前後任秘書之間也頗有淵源或交誼，形成綿密的人際網絡。然而，後期四位秘書除溫成龍外，任職時大多與林氏居住日本，活動與人際接觸不如在臺時期活躍，秘書之間的交集也較受限。至於後期秘書的社會或經濟活動，除林漢忠（曾任議員）外，似不如前期活躍。溫成龍始終未離開林家，溫成章任職臺灣企業，林瑞池則任職於林氏持股的臺資商事。

### 譯事活動及目的

若以日治時期為範疇，根據歷任秘書所處理的譯事活動主題與通譯對象等性質（詳見網路表 7），可以林氏歐遊（1927 年 5 月 15 日至 1928 年 5 月

9日)為分界點,劃分為前後兩期。正好歐遊之際,他以長子攀龍與次子猶龍為伴,並未過於倚賴秘書,可能促成他對秘書角色定位的改變。此外,他所處的時空與時代改變,如居住日本或臺灣,以及處於戰事等情況下,應是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

根據表7,林獻堂雇用秘書的第一時期(1906-27),他在臺灣社會的影響力及企圖心都頗為突出。這段時期他的主要課題,是臺人在殖民下的因應對策及爭取奧援。從他向梁啟超請益、對日本政界大老遊說(日臺同化),乃至爭取各界改善臺人處遇(如撤廢《六三號法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通譯紀錄,均可佐證他長期持續的作為及用心。

在這長達20年以上期間,從林氏與許嘉種到葉榮鐘五位秘書的關係,也頗有值得一提的共同性。該時期歷任秘書大多和漢文俱佳,且懷抱強烈民族意識,與林氏在臺政議題上形成一個具有共同意識與行動力量的社會群體。他們有志一同,先後投入同化會、文化協會、撤廢《六三號法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並長期擔任重要幹部。此中皆與林氏積極投入資源的作為與影響有相當關聯。

從1928-1945年日治終結為止,他所任用的通譯屬性有明顯改變。最大的差異是他開始以家人或親戚為通譯。除了1940年的秘書兼通譯林漢忠是林氏侄孫外,1941-45年間充當通譯次數最多的也是家人或親戚。同時,他的秘書屬性也從對外的社會政治面向,轉為對內處理林氏家族財產或事業等範疇,例如投資、訴訟、應付警察、人際酬酢、詩文往來等。與前期相同的主题,大概只剩拜訪群賢及討論時政了。此外通譯對象也出現變化:多以公司股東、檢察官、律師、媒體、憲警、政界人物為主。

固然,後期資料出於日記,有可能因偏向日常生活或業務的描述,而做出前述推論。然而依前後期議題的社會性及宏觀性觀之,兩者落差可說顯而易見。後期秘書兼通譯的家族性與個人角色,與前期社會議題的改革性與群體性,差異更是明顯。

就所處的時空環境而言,前期林氏除了為撤除《六三號法案》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奔走之外,極少在日長期滯留。但在1936年6月17日的「祖國事件」打擊後<sup>11</sup>,他與家人滯留日本時間趨於長期<sup>12</sup>,似乎對於臺灣社會改造的雄心也有所降溫。

綜而言之,從譯者的家世與性格、教育與語文能力等個別屬性,到他們投身林獻堂而產生的社會活動與參與情況等,可以看出譯者因贊助人而發生的內外質變。透過對通譯活動的觀察,也可窺知贊助人的社會角色變化及遷移軌跡。(詳見網路表8)

## 結語

從林獻堂身邊的譯者群體及其社會活動,清楚顯現了殖民帝國的文化暴力意圖。受其壓制之下,林獻堂唯有透過譯者居間傳譯,才能明白表達不願屈從的意志,而又免受統治當局語言統一政策的壓制。這個對抗的意念在日治下的近30年間,林氏透過譯者發聲,同時也透過對譯者的培養提攜,在其身邊形成一個日益鞏固的文化與社會群體。從其日記可知,林氏結合日本政界、學界、乃至媒體等,共同挑戰當時臺灣政治的體制,並以提升臺人權益為目標。而奔走於臺日之間的同時,也讓那些具有感染力的社會議題,得以迂迴的衝撞既有體制。

此外,林氏與其譯者透過綿密的接觸,達成殖民統治對臺人的鬆綁。為此,林氏藉由本身社會聲望

與財力資源，透過秘書兼譯者的經常疏通，尋求日方學界、媒體、歷任總督、各級官僚（地方警政主管）等社會菁英對臺人的同情與理解。臺中中學的設立、臺人辦報的獲准等，都是具體可見的突破與貢獻。而林氏身邊的譯者可說是無役不與。

林氏與其譯者還透過地理上的移動，達成抗衡殖民統治的目的。首先，他將林家子弟送出臺灣，以獲得教育的選擇自由。對此，前後任秘書甘得中、莊遂性發揮了相當的助力。其次，他於 1927-28 年與二子出遊歐美一載，可視為對外取經以提升在殖民統治下生存能力之計。彼時的譯者即由兩子充任。至於第三類的移地行動，即「祖國事件」後避居日本，藉此免受殖民地高壓統治之苦，也需適任譯者同行（溫成章、林漢忠），才可讓此計畫落實。

為了維護文化暴力下的話語權與社經權益，他的秘書兼通譯有投入地方選舉者（許嘉種、甘得中），也有投身報刊媒體者（葉榮鐘、林漢忠），還有開創文化事業或團體者（許嘉種、莊遂性、施家本）。在他們的行動背後，無論理念、資金、人脈，都與林氏的支持密切相關。

林獻堂歐遊之前的 20 餘年，由於致力改善臺灣社會政治環境的共同理念，林氏積極發揮贊助人角色，從培植學生以厚植其知識力量，廣結中日社會賢達以充實其言論內涵，到穿梭於日臺政界要人以形成政治影響力，進而辦學、辦報、結社，並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形成前所未有的思想震撼與破冰行動。

以殖民統治下的政治與社會脈絡而言，林氏群體的辦學、辦報、結社等行動，可以視為具有開創臺灣人「公共圈」（public sphere）的實質意義。其

推動過程中所觸及的言論權、參政權、資本自主權等主張，同時也挑起了被支配民族的「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意識。而這些行動裡，若無譯者的介入，亦難以發聲。

而這些譯者，除了林氏秘書兼通譯之外，那些受其資助的學生、受其影響而加入運動者、乃至參與臺人興業者等，都是其譯者群體的一部份。本文受限於篇幅與主題範疇，文中尚未論及林氏秘書以外的譯者，盼能於未來就此課題繼續深入探索。∞

本文參考資料請見〈數理人文資料網頁〉<http://yaucenter.nctu.edu.tw/periodical.php>

#### 本文出處

本文出自作者在中研院臺史所訪問研究的成果，收錄於專書《譯者養成面面觀》（2012），書林。

#### 延伸閱讀

▶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

▶ 黃富三《林獻堂傳》（2004），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的通譯〉，《輔仁歷史學報》第 18 期（2006）。

▶ 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2000），晨星。

① 1936 年 6 月 17 日，日人賣間善兵衛在日軍部的支持唆使下，利用林獻堂應臺中州知事之邀，赴臺中公園參加始政紀念日園遊會時，為數月前在中國發言「歸回祖國」，當眾掌摑林氏耳光，是謂「祖國事件」。此後林氏即有早日離臺避居日本之念。引自黃富三《林獻堂傳》（2004），臺灣文獻館，頁 58-59。

② 1937 年 5 月 18 日至 1938 年 12 月 11 日，1939 年 4 月至 1940 年 10 月 27 日。